

十九世紀末以來，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印象是模糊而扭曲的：孔夫子頭戴瓜皮小帽，身穿左衽長衫，拖着長辮子，仿佛是中國城裏雜貨的店員，或雜碎餐館的跑堂。不過，在西人心目中孔子的形像，逐漸改變了。

歐洲大陸輝煌一時的啓蒙運動，和形上學的爭辯，到十八世紀中，由一位眇小丈夫康德(Immanuel Kant, 1724-1804)給畫上句號。在政治方面則是“科西嘉的小軍曹”拿破崙(Napoleon Bonaparte, 1769-1821)，一世之雄，躍登歐洲皇帝高位，至終卻被囚死在海倫那岩石的島上，代表着浪漫主義在海浪聲中消失。

康德超越當時形上學的喋喋爭議，把可知範圍限於形象界，以為形象以外的本質是不可知的；孔子的“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“知”與智慧的“智”通，知道自己知道，又知道自己不知道甚麼，才是真正的智慧，如此不失為知識論的結語。康德主張以人為目的，不以人為手段，把倫理學作為簡化宗教責任，這如同心學的“天理良心”。可惜他的世界，不是大一統的中國漢王朝，無法作到黜百家而獨崇儒的代表，但總無妨其為西方大儒。

尼采(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, 1844-1900)對於康德的倫理哲學，不僅殊乏興趣，甚且南轅北轍，但那位天才狂人的觀察分析，是精確的，他亦褒亦貶的稱康德為“哥尼斯堡偉大的支那人”(The Great Chinaman of Königsberg)。尼采從康德思想中，把“以人為目的，不以人為手段”的原則完全棄絕，剝離儒家的道德觀念，並且鄙夷的加以無情踐踏；卻由竊取了“君子”和“小人”二分法。他的“君子”成為超人，超越道德的束縛，以人為手段，以達成他的目的，仿佛以人民為芻狗。至於甚麼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”，簡直是不切實際；而“溫良恭儉讓”的高度修養，處世為人，是他更難以想像的事，更無從談修齊治平的儒家最高理想了；尼采似乎是“狼文化”的鼻祖。如果他也也想到過“世界大同”，那是最可怕的政治地理。不過，任何荒唐理論儘有狂人追隨，成為傷天害理的行動。結果呢？狂人的荒謬言論和其播佈的文字，“就像瘋狂的人拋擲火把，利箭，與死亡”(箴二六:19)，至終會落在自己頭上。宗教改革的發源地，近代哲學的空中王國，竟然發動侵略，引致兩次世界大戰中失敗，瀕於滅亡，有人指出是由於其錯誤的哲學，和敗壞的音樂，似乎不是沒有道理的話，狂人尼采自然難辭其咎。

英國史學家湯恩倍(Arnold Joseph Toynbee, 1889-1975)，以為歐洲在啓蒙運動以後的發展，可以以德國文豪歌德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, 1749-1832)筆下的浮士德(*Faust*)為代表。浮士德鑽研各樣知識，不惜與代表露西弗的Mephistophilis立約，使他能夠達成最高的“魔術”，可以具有超自然的能力，任意支配一切；他看見了亮光，高喊：“我是神！”但得意不了多久，就面臨審判。歐洲出產的“超人”文化，從野獸把人變成了“神”，不是造福，不是光明的前途，越行越亮直到日午，卻是使人類社會臨到毀滅和無望黑暗的深夜，只有仰賴神的恩典，才可以得拯救。

早在十七世紀，英國劇作家馬洛(Christopher Marlowe, 1564-1593)，他的浮士德(*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Doctor Faustus*)約於1604年出版。來源是根據同一傳說，結局則有不同。主角浮士德，在營求知識，與魔鬼立約，出賣自己的靈魂，得到的是超自然的能力，滿足了自己情欲和驕傲，經歷一切享樂，最後到時鐘指向十二點，時間滿足，掙扎無望的被拖入地獄。

二十世紀初，正是中國追求西化的時候。許多敗家子看咱們這破舊的老宅子，該爛賤賣給人拆掉另建。可有人發現，地底下還埋着寶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，找了個英國實證主義哲學家羅素(Bertrand Russell)東來講學；因為期望那位反宗教，反道德，宗科學的教授，正是他們心目中的新聖人偶像，必然會給中國指示出路。哪知羅素在周訪列國之後，思想已經轉變，給中國文化重新估了個出人意外，相當高的評價：“如果歐洲和美國人彼此砍來殺去，同歸消滅，並不見得就是人類的盡頭，也不意味文明的結局，一定還有許多的中國人存留；中國是我所見最偉大的國家。不僅是最多的人數，最高的文化，看來更有最高的才智。我不知道有任何別的文明，如此開放，像他們那樣的願意面對現實，而不扭曲成別的模式。”(1924年五月四日訪談)儘管你不必需佩服羅素，但這近百年前的預言，不能不說是喜訊：對於中國人，和地面上所有的人，都似如此。

從康德開始，到德國偉人俾斯麥(Bismark-Schon-hausen, 1815-1898)鐵血宰相，並不低看東方的破落戶，他對往訪的傅相李鴻章說：中國若與德國携手，將成爲世界上鮮有匹敵的巨大力量。大致說，德國傳統上對中國相當友好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，也是如此。儒家哲學的潛流，影響着康德和他以後的智者們。現在的孔子學院到處流行，加上這四五年來倡議的“一帶一路”，德國與中國關係都相當的積極認同。

對於某個國家或文化的命運，如何歸趨應合，要加以斷定，應該不是簡單的事。但按照聖經指引：“罪的工價乃是死；惟有神的恩賜，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，乃是永生。”(羅六:23)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